



厦门市首批公派 出国留学人员学习成果汇编

Compilation of Thesis Abstracts of Xiamen Government
Scholarship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中共厦门市委组织部编

厦门市首批公派
出国留学人员学习成果汇编

Compilation of Thesis Abstracts of Xiamen Government
Scholarship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英国组

地方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比较研究.....	1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5
中国的增值税制度分析.....	12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问题分析和改善建议.....	16
运用政策趋同理论探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变化.....	21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改革.....	26
中国城市房产政策改革的社会效应.....	33
探讨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	37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中角色地位问题的思考.....	42
在当前国际体制下 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	46

荷兰组

厦门吸引台资光电产业转移的潜力研究.....	55
城市政府在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中的角色.....	59
WTO报复机制之历史嬗变.....	64
产业集群对创新能力与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68
公共服务动机的中国研究.....	79
公共部门比较值在中国私人投资优先决策过程中的运用.....	85
厦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89

澳洲组

创新营销模式 防范软件盗版.....	97
运用ITO模式理论评价海沧污水处理系统项目管理.....	104
丰田企业的知识管理.....	111
中国企业跨文化管理实践.....	117

地方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比较研究

——厦门市与英国赫尔市之比较

中共厦门市委组织部 林卫东

一、研究目的

这篇论文是关于厦门市政府和英国赫尔市政府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比较研究。两市同为所在国的地方政府，但所处制度和文化环境极为不同。研究的首要目的是发现两市人力资源管理的异同，以及对这种异同的制度与文化解释；其次，作者期望这篇论文能为我国地方政府学习、借鉴西方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背景

厦门市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人口约 150 万，是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港口吞吐量位居国内第 6，世界前 30。赫尔市地处英格兰东北部，人口约 25 万，曾是世界第一大渔港。英国的行政隶属关系比较复杂，名义上分五个层级，即中央政府、地区、县级、区和镇，实际上只有三个层级，地区一级除大伦敦区外均无行政实体，而镇一级只承担少数公共服务职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实体。赫尔市政府为县级，直接隶属中央政府，由地方议会和行政管理机构组成。地方议会由选举议员组成，负责制定政策。行政管理机构由常任事务官员组成，负责执行议会的有关决策。

三、研究方法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比较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制度学派，一是文化学派。二者均认为管理活动因组织环境而变，制度学派强调制度环境如政治、商业、法律体制对管理活动的影响，文化学派则强调文化因素（如行为、价值观、信仰和人际关系等）对管理活动的影响。本篇论文将同时运用这两种方法展开研究。

四、研究发现和讨论

论文将对两市政府的人事管理系统、选拔任用、绩效管理、工资体系以及培训与发展等人力资源管理的五个主要方面进行比较，并运用国家制度、国家文化、组织文化和管理趋同四个要素讨论研究发现。

1、人事管理系统

厦门市的公职人员分为三种类型，即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国企员工。对三者采用不同的管理办法，适用不同的工资体系。赫尔的公职人员约 14，

500人，分三种类型，即体力工作者、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所有公职人员均为政府雇员，在同一规则和管理系统之内录用、签订合同和领取薪酬。两市的职位管理系统有很大不同。厦门市的职位管理系统被称为编制管理，通过“三定”，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对各机构职位数量实行总量控制。而赫尔市对职位的管理是通过职位描述文档实现。文档体现了特定工作岗位的主要特性，包括十二个方面的内容，包括目的、内容、职责、决策属性、隶属关系、工作能力、工作关系、人际沟通技能、工作条件、智商、身体条件及情商等。每一名雇员都必须与主管经理共同完成对其职位的描述，并经过人事专家的审查。两者相比，编制管理比较宏观，而职位描述文档比较细化。从文化角度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方偏重综合而西方偏重分析的思维习惯，反映了西方所谓“科学管理”致力于将工作分解细化的倾向。从制度环境看，编制管理是国内机构改革的产物，目的是防止机构膨胀，节省行政预算。职位描述文档则包含了为特定职位建立层级、形成合同的一部分、制定资格条件等多重目的。职位管理的不同也反映了两国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机构改革频繁，为每一职位制定描述文档代价较大。

核心人事部门在两市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很大不同。在厦门，组织部和人事局为核心人事部门，是干部任用和提拔的审批和具体操作部门。由于其在人事决策中的重要性，核心人事部门经常被视为“权力”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经常被视为上下级关系。组织人事部门所扮演的“权力”部门的角色，一方面根植于儒家传统对等级和权力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党管干部原则的具体体现。在赫尔市，人事部门是其他部门的服务提供者，《赫尔市人力资源服务标准》指出，“人事服务为内部服务，其标准参照相关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服务标准制定，以确保我们的客户能得到物有所值的服务”。人事部门的这种定位反映了英国平等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是内部市场发展的结果（这又是由英国基于交易原则进行的公共部门改革所造成）。

2、选拔任用

两地对工作人员的选拔任用程序都比较规范。在厦门，干部的选拔任用分为两个独立的程序。对初级公务员，必须依据《公务员法》，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下面向社会招考，主要包括笔试、体检、面试等环节。对初级以上公务员的提拔，属内部程序，必须严格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进行选拔任用，主要包括民主推荐、考察、集体研究和任前公示等环节。赫尔市对政府雇员的选拔只有一个程序，一旦某个职位出现空缺，就必须依照《赫尔市政府招聘和选拔手册》，在公平、实效、效率、质量的原则之下，根据实际情况，面向社会或内部进行选拔。这由招聘和选拔两个过程组成。招聘包括必要性评估、职位描述、资格条件和发布招聘广告等四个步骤。选拔包括根据资格条件进行筛选、推荐、面试、审查（如学历证书、移民、犯罪记录）、录用等步骤。两地对选拔工作人

员程序的规范性要求，反映了公共部门“以规则为中心”的组织文化。在这种组织文化中，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必须依据预设的规则，按照标准化程序进行操作。

二者相比，厦门市选拔干部的程序显得更为严格，而赫尔市对选拔公职人员更关注成本效益。为确保公平，厦门市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使用了一些时间长、程序严、人力和物力成本较高的方式，如公务员考试、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纪检部门被要求参与其中。此外，上级人事部门还定期对《条例》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赫尔市对公职人员的选拔在强调程序的同时，对时间和成本也作了充分考虑，并提供了一些选择性方案：决定面向社会或在内部招聘，或从现有雇员中调配，或邀请近期同等条件职位的申请者参与等等。招聘时不进行笔试，面试也只有部门经理等两、三人参加。这种对选拔程序关注点上的差别，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来自于两国政府改革的不同指导原则。在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改变基于“人治”的人事管理，建立基于“法治”的人事管理，以防止权力滥用。在英国，市场原则被用于指导行政改革。因此，人事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被重新定义为服务提供者与客户关系，服务成本和效益受到更多的关注。另一原因，来自于政府所面临的公众压力程度不同。在中国，由于就业形势紧张，大大增加了工作稳定、社会地位较高的公务员职业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也引起公众对公务员招考公平性的高度关注。为避免各种关系的干扰，招考程序日益严格。而赫尔市政府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公众对公职人员招聘中各种歧视的关注。这使得政府在招聘过程必须小心从事，避免招致与性别、种族、残疾人歧视有关的法律诉讼。

3、绩效管理

厦门市的绩效管理称为年度考核，每年举行一次，由同事和下属对干部进行民主测评。被评为优秀的，可获得奖励；连续两年不称职，可按规定辞退。赫尔市的绩效管理称为个人绩效与发展评估，用于目标管理和发现个人的发展需求，每年两次，在部门经理和雇员之间进行。第一次会议，主要是通过协商设立工作目标，同时确认雇员的发展需求并制订相应的培训计划。第二次会议，主要是对第一次会议所设的目标和培训效果进行回顾，并作进一步修改。厦门市参考群众观点进行年度考核，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维护和谐工作关系的儒家传统理念。一般认为，西方社会倾向于使用物质奖励，而亚洲社会倾向于使用精神鼓励。比较有趣的是，厦门市把绩效管理 with 物质奖励挂钩，而赫尔市则把绩效管理与培训相联系，这是东西方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趋同和相互借鉴的结果。

4、工资体系

两地工资体系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折衷，并考虑了不同地方的经济状况。国内公务员工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础工资，各地相同，由中央财政支付；二是地方津贴，根据当地经济状况确定，由地方财政支付。英国地方政府雇员的工资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其工资体系首先由中

中央政府制定一个等级工资框架，分为1级到17级。中央政府每年都要和全国性工会进行协商，重新确定每一级工资所对应的数额。地方政府则按照中央政府制定的工资框架，根据当地经济状况，与当地工会每年重新协商各个工作岗位所对应的工资级别。因此，赫尔市的政府雇员的工资比起伦敦要低许多。两地的工资体系反映了世界性的政治现实，即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和博弈，中央政府强调一致与公平，地方政府则强调选择与效率。

厦门公务员的工资主要由职级和工作年限确定。赫尔市政府雇员的工资级别在其职位描述文档中给定，主要根据该职位所要求的技能与责任确定。因此，即使处于同一管理层次的工作人员，所对应的工资级别往往不同。两地的差异反映了国内注重等级的观念。此外，在私营部门广为使用的基于业绩的薪酬制度，在两地均未实行。这与政府部门重公平甚于效率的组织文化有关，同时也反映了非营利部门中员工业绩难以量化的现实。从工资差别看，厦门公务员的差别较小。厦门市政府部门正职与科员的差距不过一倍左右，而赫尔市政府部门经理之间的差距最高可超过一倍。这种对工资差别接受程度的不同，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团队精神与组织内部的和谐，同时平均主义传统形成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理念，因此在一个组织内工资差别过大难以被接受，国内历次的工改不但没有拉大反而缩小了工资差别。而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英国，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5、培训与发展

两地对工作人员的培训都非常重视。厦门公务员培训内容更为广泛，与工作不一定直接相关，如学历培训和政治、经济、法律等综合知识培训。这主要是为了适应政府部门广泛的社会职能以及公务员相对频繁的岗位交流的实际情况。相较而言，赫尔市的政府雇员培训更注重与工作内容的^A相关度。其培训计划分为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一般培训免费，指岗位培训，内容系统而连贯，培训对象包括从基层的体力工作者到高级经理人员。这种培训方式与其选拔制度有关，因为所有空缺职位都需公开招聘而非内部提拔，最后录取的很可能是从社会上或其他部门的人员，因此需要重新进行岗位培训。专门培训需要收费，是针对提高各部门的服务质量而设计。这是由于政府部门内部市场的形成，使得部门之间提供的服务也需要计算成本。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 厦门案例研究

厦门市外资局 张斌娜

内容摘要

全球化，特别是世界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不断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是当今学术界与管理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影响持不同的态度，他们采取不同策略来应对全球化的影响。本论文旨在通过该领域的主流理论分析，结合中国实践，进行一些政策层面的研究，希望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采取适宜对策、实现收益最大化提供一些启示。

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生产与市场上跨国界联系与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它反映了贸易自由化以及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国际资本流动与技术合作增强的趋势(邓宁, 1998)。本论文认为尽管全球化不完全是一种“赐福”，但是世界贸易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扩张给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会，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调整策略以抓住机遇，实现利益最大化。论文比较了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展模式，并以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城市之一——厦门为例，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全球化的影响中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些政策建议。

论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及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第二部分分析了有关世界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主流理论，提出了理论框架。第三部分为厦门的案例研究。第四部分总结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引言

全球化是一股无法遏制的趋势，它由生产力与技术进步引起，以资本、技术、服务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配置为特征，通过全球竞争的加剧、新的生产中心的兴起、新技术的发展、国际资金流通的便利化、跨国公司的扩张以及各国政府在国内外经济事务中的不断变换的角色表现出来。

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影响持有不同的态度。在拉美，全球化在社会与文化上受到了强烈的抵触，因为全球化对他们国家的经济主权与安全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撒哈拉非洲，众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停滞或衰退状态，他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贫困问题日渐恶化。然而，在新兴亚洲地区，许多

国家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调整政策和制度，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活动并从中受益颇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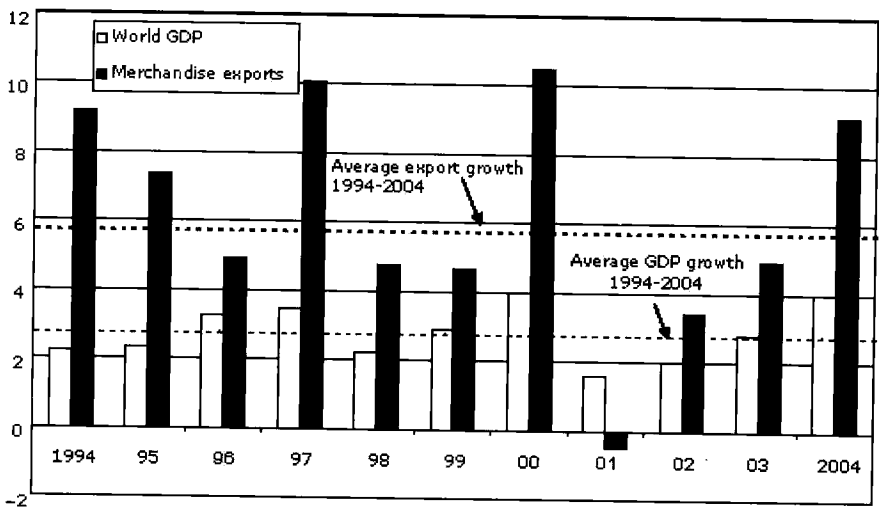
中国和印度是近年来最显著的例子，由于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开放经济，吸引外资与跨国公司的入驻，他们的许多大城市或有优势的城市发展迅猛，成为国际生产网络中重要的节点。应该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适宜政府策略是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必绝对悲观，而应现实地寻求更多的收益，同时，避免全球化所伴生的风险与危害。

一、全球化的趋势

有关“全球化”的定义很广，本文简化以不断增长的世界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影响及国际生产网络的建立来代表这席卷一切的趋势。研究中以“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力”作为分析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前者指生产要素如资金与劳务的投入，后者指由技术进步、生产要素更合理配置、规模经济效应等带来的效率与生产力的提升。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迅速增长，驱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图1显示1994-2004年间世界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两倍，其中，外资与跨国公司的贡献很大，据估计，目前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约为每年1000亿美元，比20世纪80年代高5倍，7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6.9万家附属公司控制了全球1/3以上的生产资本，占全球GDP的1/10，出口的1/3，及非农业领域就业的1/5。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从80年代的0.6%增长到90年代的1.5%，预计21世纪上半叶将达到3.4%，两倍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

图1：世界贸易出口与GDP的年均增长（1994-2004年）（%）



但是，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大。总的来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开放、利用外资的增长居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之首，其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在1990-2000年间几乎减半，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800多万，撒哈拉非洲有7800万并预计于2015年增加到3.4亿。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决定了其在全球化的影响中是否受益还是失去更多、产生更多的贫困。

二、理论分析

本章对四个相关领域的主流理论进行回顾与分析，即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外商投资（跨国公司）与国际生产网络以及城市的角色。

（一）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力与经济发展

根据哈罗德多玛模型，要素投入的增加导致经济的增长。索罗模型进一步提出全要素生产力，即创造性的资产与技术进步决定了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波特的增长理论与邓宁的投资发展过程理论指出国家经济发展的几个标志性阶段，即要素驱动经济、投资驱动经济以及创新驱动经济。因此，研究全球化的影响应着眼于分析世界贸易、外资与跨国公司是否对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积累、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发挥作用，是否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从要素驱动阶段发展到创新驱动的阶段。

（二）市场作用、比较优势与对外贸易

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的标准贸易模型以及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分析了世界贸易的起因与重要性。受市场供求的变化影响，世界贸易迅速增长，加上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建立，各国的比较优势不断产生变化，从而影响到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所处的地位、结构与收益情况的变化。显然，依赖于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出口只会造成国家经济的脆弱以及人民生活的日加恶化，发展中国家应通过改善波特的钻石模型中所列出的四个要素（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的产业以及公司策略、结构等）来增强竞争力，提升比较优势，在世界贸易中取得更高收益。

（三）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与国际生产网络

邓宁的折衷理论解释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性因素，即外资与跨国公司的行为与动因。根据邓宁，外商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广度与模式由三种优势所决定，即所有权优势（O-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advantages）和属地优势（L-advantages）。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仅由跨国公司特定的优势与动机所决定，而且也由宗主国提供的有利条件与投资环境所决定，在拥有政府强大支持与优良投资环境的优势城市，经济将获得强劲的发展。

Gereffi 在全球商品链中定义了发展中国家的五种出口角色，即初级材料出口、加工组装出口、部件供应分包、贴牌生产与自有品牌生产，这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在国际生产网络的垂直分工以及跨国公司在网络中的主导影响。显然，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出口角色还很大程度上受制与服务于跨国公司的需求，这意味着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如果缺乏合适的政府政策引导，许多社会改善目标包括人均 GDP 增长、充分就业、货币稳定、收入与财富的平等分配、主权与决策权、政治与文化的独立等均可能受到扭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尽力挖掘外资与跨国公司的积极影响以真正提高属地优势，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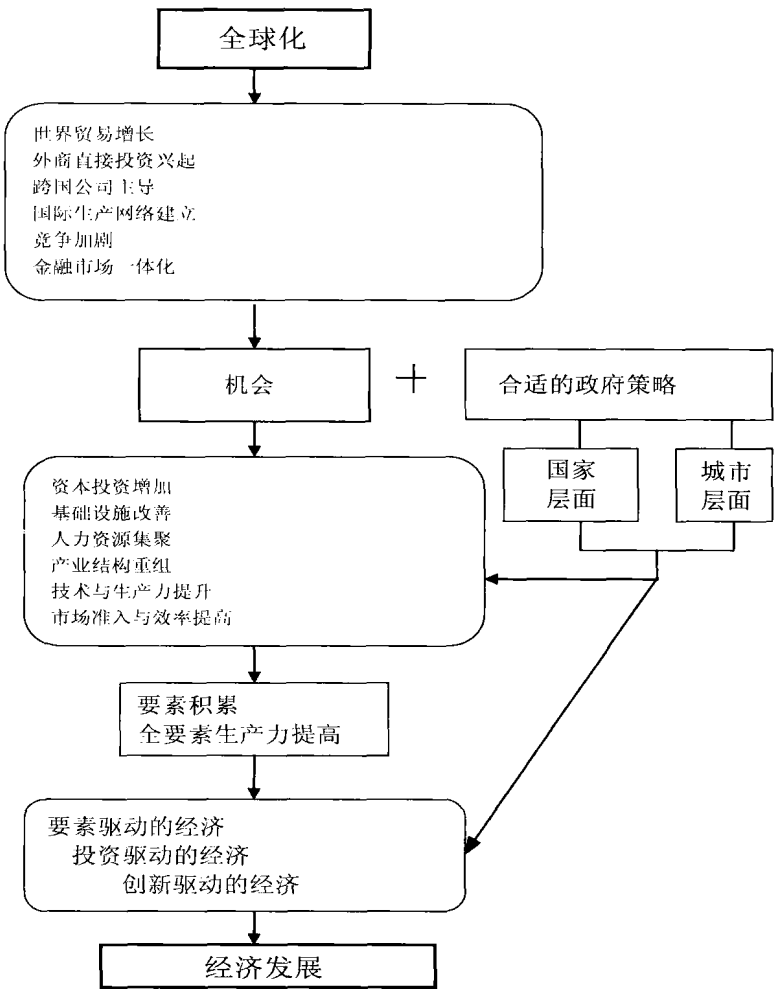
决相应的扭曲问题。正如 Thirlwall 所说，关键不在于直接谴责跨国公司的种种不好，而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寻求合适的政策制止问题的产生。

（四）城市的角色与政府策略

根据 O’ Sullivan，城市有明显的产业聚集经济优势。由于聚集经济效应，城市兴起成为国际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商品、资金、技术与人力资源的集聚使城市拥有巨大的机会与优势，加上城市独特的学习与创新功能，使城市成为带动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城市的战略地位将继续增强，这也证明了就城市层面进行案例研究的重要性。至于政府策略的选择，正如波特所言，每个国家或城市需设计自己特定的道路，因为各国的自然禀赋资源与创造性资产、经济发展策略以及政府的角色都不尽相同。

总之，以上理论回顾与分析显示全球化的影响是很复杂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关键在于如何从国家与地方政府两个层面采取合适的策略，把握机遇，实现收益最大化。相应的理论框架如图 2，以更清楚地表明其中的逻辑关系，并提供作为案例分析的基础。

图 2：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



三、厦门案例分析

(一) 城市背景 (略)

(二) 全球化与城市经济发展

1、政府策略

首先,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对厦门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厦门的发展极大地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先行者的优势。中央政府的支持可以体现在赋予经济特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开放厦门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城市之一,外企享有优惠的税率,鼓励先进技术型企业与出口型企业等。地方政府在拓展与落实这些优势政策、改善投资软硬环境方面同样成绩显著。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政府办事效率的提高、在国内外举办各种投资推介活动、建设国际学校、提供教育与在职培训、奖励科技创新与出口等,大大改善了厦门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外资与跨国公司的入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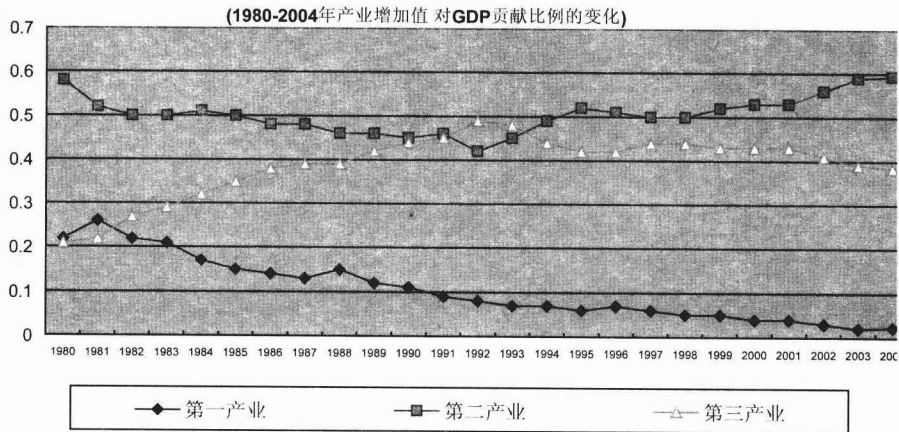
2、要素积累、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与城市经济发展

1981-2001年间厦门年均GDP增长率为15%以上,城市的经济从要素驱动跃升至投资驱动的阶段,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有明显的持续高速增长过程,这与城市利用开放经济的优势,改善要素积累与提升全要素生产力密切相关。例如,80年代初,厦门受益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支持,调动各种资源建设经济特区,期间的经济增长全为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80年代后期,基础设施建成并投入使用,创造性资产如人力资源、技术进步、制度改革、市场效率等得到很大改善,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外商实际到资呈正相关关系,要素投入的贡献率为81%,全要素生产力投入的贡献为19%。90年代,全要素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2.32%,外资对厦门经济起积极拉动作用。

3、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与产业发展

厦门二十年来产业的迅猛发展很大部分应归功于外资与跨国公司的贡献。2004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0%、出口的64%、地方财政收入的40%为外企贡献的,70%以上的外企赢利,利润再投资占全市新增外资额的40%。图3显示了厦门1980-2004的产业结构变化,显然,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强劲增长,2004年对GDP贡献率为59.3%(为农业增长率的30倍,比服务业高20%)。同期,制造业的就业一直上升,服务业也发展迅速,对GDP与就业的贡献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就制造业的表现来看,电子、机械、化工为工业支柱产业,且在福建省的区位商均大于1,这表现了城市产业竞争实力以及在地区内的相当优势,无疑厦门的兴起对福建省以至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图 3： 厦门产业结构发展



资料来源：厦门市统计局，2005

4、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外贸特别是净出口的增长，带动了厦门经济的增长。2001 年，厦门市进出口贸易额达 110.8 亿美元，比 1981 年增长 72.2 倍，其中出口 65 亿美元，比 1981 年增长 45.1 倍。机电产品的出口比例逐年增长，厦门从最初的在全球商品链中低水平的出口地位发展成为以高附加值产品与较高获利产品出口创汇的城市。

但是，也应从投资、贸易结构中看到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经济发展中隐含的问题。例如，加工贸易的主导方式暗含着对城市经济长期发展的不利影响，因为对进口部件与元件的简单加工复出口意味着本土企业很难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提升其生产力，很难与跨国公司建立起较强的供应链关系，并且，在厦门的大部分外企仍把其研发与核心技术放在母国，更使这种不良影响加剧。此外，城市受困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本土企业的产业竞争力较弱、人力资源的集聚有待进一步加强等众多问题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对厦门过去 20 多年经济发展的分析显示政府的支持、外贸、外资与跨国公司的明显贡献。城市全要素生产力显著提高，产业聚集效应显现，城市以不断创新的优势增强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竞争地位。

四、结论

总之，理论与实证研究证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贸、外资与跨国公司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机会，加速了城市的要素积累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推动城市投资驱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应着力提升比较优势，壮大产业竞争力，争取在国际生产网络中更有利的地位。

厦门的案例研究体现了现实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何在全球化的影响中把握机遇、采取适宜的政府策略从而获益。地方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深入挖掘

外资与跨国公司的溢出效益，集聚本土人才，培育创新能力，使城市的特色优势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得到充分发挥，使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

全球化的影响迅速地在改变，合适的策略不仅在不同的国家中不同，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与城市也不同。由于时间与资源有限，本论文主要讨论了全球化对目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影响，它更偏重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没有涉及经济发展的其它方面如收入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与环境影响等，这些领域需要在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的增值税制度分析

厦门市国税局 叶文伟

内容摘要

这篇论文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增值税制度，同时有助于了解将来中国增值税制度的改革。

本论文尝试探讨中国现存的市场经济环境及其对现行增值税制度的影响，对比中国增值税制度与英国增值税制度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同时认真分析中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与众不同的市场经济环境对增值税制度的实施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度在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于英国的增值税制度。通过比较分析，将有助于对比中国增值税制度和英国增值税制度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特别是英国的增值税制度能为中国的增值税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自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增值税已经成为中国现行税制的主要税种。但是，现行的增值税制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建立一个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新增值税制度势在必行。而且，在将来的增值税改革中必须认真考虑中国独特的市场经济环境的有关因素。

在论文的最后，作者对中国的增值税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主要内容

过去50年，增值税在世界各国得到迅速推广应用，主要与增值税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增值税是一种间接税，主要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多环节税，实行道道环节课征，但不重复征税；二是具有税收中性效应，对资源配置不会产生扭曲性影响。另外，由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广，具有广阔、经常和稳定的税源，增值税已成为政府税收收入的稳定来源。因此，自从1954年法国率先采用增值税以来，增值税已成为全球税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报道，截止2006年，增值税已在世界136个国家广泛运用，并已成为这些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中国，增值税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作为一个新税种引进的，设置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共享税种。但是，不同于在许多国家广泛实行的消费型增值税，在中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在中国，国家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流转税，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在过去十几年里，增值税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据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统计，

2004 年增值税收入达到 9017.9 亿元, 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 37.3%, 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 6.6%。

笔者认为, 中国的增值税制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增值税制度,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环境有很大的差别。本论文尝试通过分析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及其对增值税制度的影响, 比较中国和英国增值税制度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探讨中国现行增值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最后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一、分析中国现有的市场经济环境及其对增值税制度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 税收是政治和经济的混合体。经济环境对税收政策的制订有重要影响, 而税收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中国, 税收政策的变化反映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 但是, 一个有效的税收制度的建立却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首先, 市场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不利于某些税种比如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其次, 低层次的税收管理水平也是另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之所以选择生产型增值税, 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国情明显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但是, 中国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 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造成社会活动中复杂的人际关系。

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有重大影响, 因此在税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认真加以考虑。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当前迫切需要尽快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由于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设计增值税制度的时候必须通盘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 增值税制度改革必须与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笔者认为:

首先, 增值税改革必须建立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时间, 法律规范, 信用机制以及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民众的纳税意识和政府的税收管理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 增值税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和政府的税收管理水平。

其次, 增值税改革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 地区之间的差异日益明显的现实状况。中国复杂的现实造成增值税管理的成本非常巨大。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考量是得不偿失。

最后, 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在经济转轨阶段, 不论是商场上还是官场上, 道德规范, 法律规范, 信用体制等等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税收领域, 伪造增值税发票偷逃税款等犯罪行为屡禁不止, 严重侵蚀了政府的税收收入。

总之, 在经济转型时期,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

的规则存在不少冲突，矛盾的地方。因此，中国的增值税改革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型，而必须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相适应。

二、比较中、英两国的增值税制度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虽然中、英两国实行的增值税制度存在某些相似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是体现出本质的不同。

英国的增值税制度是典型的“欧洲型”增值税模型，而中国的增值税制度可以看作为“准欧洲型”的增值税模型。两者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首先，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较广，而且其税收负担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其次，增值税的征收遵循目的地原则。所谓目的地原则，指的是增值税的应税产品仅限于那些由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最终消费的产品，而出口的应税商品和服务则是免征增值税的。第三，增值税的征收采用凭增值税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信用管理办法。

上述特点充分体现了增值税的一个显著特点：税收的中性原则。也就是说，增值税的优越性在于不会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性影响。

英国的增值税制度和中国的增值税制度的不同点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增值税的应税范围明显不同。英国实行的增值税属于综合型的增值税，其征税范围覆盖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农业。而中国实行的增值税仅仅是有限型的增值税，仅限于在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大多数服务业项目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第二，两国采用不同类型的增值税制度。英国实行的是消费型的增值税。也就是说，企业购进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进项税额都可以抵扣。相比之下，中国采用的是生产型的增值税，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允许在当期销项税额中扣除。生产型的增值税制度确保了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但是也限制了投资的增长。第三，两国的增值税税率结构不同。在英国，现行增值税实行三档税率：17.5%、5%和零税率，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零税率的广泛运用，有16大类的商品和服务采用零税率，包括食品、燃料和公共交通等。在中国，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实行三档税率：17%、13%和零税率，小规模纳税人则适用6%和4%两档税率。零税率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第四，对增值税进项税额的管理采用不同的办法。虽然两国同样采用凭增值税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机制，但是，由于英国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信用体制，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和较高的国民素质和自觉的纳税意识，保证了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信用管理体制能够顺畅运行，征税成本小。相反，在中国，由于尚不具备成熟的市场经济信用体制和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普遍较差，因此在增值税的推广运用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管理，建立了金税工程，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税控系统等，大大增加了征税成本。

通过比较分析，学习英国的增值税实践经验，将有助于今后中国的增值税改革。